

戀愛與留學

張谷

蔣碧微女士經驗談

從民國初年的民智不開，風氣蔽塞，以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今天的教育普及，男女平權。這其間，確曾經過千千萬萬男女志士的前仆後繼，奮鬥不懈。筆者不否認目今老年人與青年人之間有着「代溝」的存在，然而，天生萬物的進化歷程，畢竟是逐漸演進，一代勝似一代，而決非一蹴

而就，驟然蛻變的。

而就，驟然蛻變的。現代的男女青年，國民義務教育受到九年為止，高中、大學、出國深造，一扇扇的大門全部敞開。同時，戀愛自由，婚姻自主，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」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。亞洲地區，朝發夕至，美國歐洲，噴射機航程也不過三五天。幸福快樂的現代男女青年啊，你們可願超越代溝，回顧一下你們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？在此，請

您細閱筆者訪問蔣碧微女士時的大段談片

「距今五十五年前，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，我因為對我那位十三歲訂親、始終沒見過面的未婚夫感到不滿，——他在

復旦大學唸書，命他的弟弟來跟我父親要一份大考國文試題，使我非常難過，認為他想作弊，適足以表現他的沒志氣。由而我更同情欽敬貧家子弟，苦讀成名的徐悲鴻先生，覺得他有毅力，肯上進，必將有遠大的前程，值得當年實足年齡十七歲的我，應他的要求離家出走，遠涉重洋，一齊到法國去留學。

蔣碧微教授早年玉照



「徐悲鴻先生和我是宜興同鄉，曾與

我的伯父、姊丈共過事。當父親在復旦大學任教，他則獲得哈同公園總管姬覺彌的激賞，資助他在震旦大學就讀，時刻不忘留法，專攻美術。因而成爲我們家的常客，徐先生也曾向我父親執弟子禮。但是，禮教攸關，家法所限，我們固然不時見上一面，却沒有單獨相處，或是談一句話的機會。如今追憶，當他和我某一天聽母親閒的談起，我的未婚夫家，明年即將迎娶。一會兒，母親下樓，他也告辭離去，我正伏在桌上吞聲飲泣，徐先生以遺落一條手帕的藉口，匆匆折返，柔聲的安慰我一句：

「『不要難過。』」

「在我們離家「逃亡」，結爲夫妻以前，這「不要難過」四個字，便是我們唯一的「情話」了。沒有海誓山盟，更那來紅鸞照命？

「那麼，徐先生又是怎樣求婚的呢？」

「他小心翼翼，而且也費盡唇舌，說服了我家的另一位常客，因大膽從事改革而被目爲「怪人」、名人的朱了洲先生，他在上海務本女學教體育，年齡比我大得多，也是同鄉，和我家還沾點親戚關係，但却尊稱父親、母親爲先生師母。有

一天，他到我家來，乘父親母親不在，他悄然語我：

「假使現在有一個人，想帶妳到外國，妳去不去？」

「把「不要難過」的慰藉，和「妳去不去」的問題，兩相連貫起來。徐先生對我的懸懸情意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於是我說：

「我去。」

「三句話，就此締結姻緣。你說這是速度太快了呢，還是過於迂迴曲折？」

「祕密祇有三個人知道，如何使我順順當當的離家而走，一道放洋，那却祇有徐先生細心策畫，妥善安排。他先開始放煙幕，到所有的親戚朋友、同鄉同學那兒去辭行，說他將於某月某日出國，甚至於我的父親、母親都還請他喫過錢行酒，臨別依依，互道珍重。其實他還祕密的留在上海，閃閃躲躲，絕對不能碰見熟人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忙着給我辦理出國手續，購置必需用品，做了一些由他設計的衣服。他的匿居處是辛家花園，戊戌政變主角康有為的家裏，因為他是康先生的入室弟子，住在那兒比較便利。」

「我也有一處很機密的通訊聯絡地點，我父親有一位同事，在我家附近的民厚北里辦了一所小學，他和我父親商量，要我到學校幫忙教書，父親答應了，徐先生正好可以把信寄到那裏。」

走出家門的第一步

蔣碧微女士追憶的說：

「民國六年五月十三日，我收到了徐先生的一

封長信，那像是一道包括注意事項在內的作戰命令，字裏行間看得出他的心情緊張，憂思忡忡，唯恐我偶一疏忽，會導致整個計劃的失敗。徐先生要我在當天天黑以後，當朱了洲先生應他之請，特地請父親、母親和二姑母外出喫飯聽戲，離開家裏，僱一輛黃包車，到愛多亞路長發棧跟他會合。徐先生在信上叮嚀的說：

「僱黃包車要僱車伕留辮子的，因為這種人比較可靠老實。」

「當晚六點多鐘我準備離家，行前寫好了一封信，稟告父母雙親，故意使信中的文字含混，有點厭世自殺遺書的意味。然後把信插進母親放錢賬的抽屜，折身下樓，心酸酸的走出了家門。」

「黯然心酸以後繼之驚慌失措，我僱了車，却无法顧及車伕有沒有留辮子，坐在車上又怕隨時會和父親母親劈面相逢，黃浦灘的璀璨燈火，在我看來宛如噬人的巨獸。好不容易到了愛多亞路，站在長發棧門口，急如熱鍋螞蟻的徐先生接到了我，滿面洋溢着喜色，可是他連一句話都來不及說，忙不迭的挽我同到另一家客棧，就好像父親、母親正在高聲喊叫，追在我們的後頭。」

「甚或在那一家不知名的客棧，也不會就擱多久。徐先生和我坐下來歇了口氣，勉強心神，又得結賬僱車，上虹口碼頭。」

「我們頻頻的回頭望，步上翌日清晨駛往長崎的日本博愛丸。」

「到了輪船裏我們才開始說話，徐先生告訴我：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歐洲慘烈的進行，法國砲火連天，遍地創痍，他不能帶我去冒這

樣大的危險。因此，我們的留學地點，暫且改在日本，等歐洲大陸的戰爭打完，我們再去法國。」

「到日本後，我們在東京住下，才三個月，我的姐夫程伯威先生在復旦大學畢業，他也到日本來繼續深造。經過四出打聽，他終於找到我們了。」

「經由他的敘述，我們方才曉得，我的出走給家裏掀起了軒然巨波。就在我們登上博愛丸的時候，父親、母親和二姑母玩得很盡興的回到了家裏，首先發現我的「失蹤」，繼而又找到我的遺書，當下的這一驚，真是非同小可，家中立刻響起了哭聲，幸虧父親鎮靜，「知女莫若父」，他認定我決不會去尋短見，而且還得了一個靈感，整個事件必定與朱了洲先生有關。他挽着母親連夜奔走，先去找到了朱了洲。」

「朱了洲心知我們還沒有離開上海，又覺得從實招來無顏以對先生師母，所以他決定一口否認，決不知情。一時情急之下，連我若曉得將來必定給炸彈炸死的重咒，都發了出來。——然而這却反使母親和家人更着急了，唯有父親，堅持相信我仍在人世，祇是我對早年所訂的婚事有所不滿，因而在雙方討論婚期的時候，毅然出走。他使掩面悲泣的母親漸漸相信了他的說法。緊接下來，就是如何掩蓋女兒的「失蹤」，免得引起親戚朋友的議論，玷辱陽羨大族、書香世家的門風，還有，蘇州親家必將立至的嚴重抗議、上門要人！」

「家庭會議的結果，祇好推說我忽得急病，不治夭折，同時，這也就是說，蔣家不再有我這個女兒了。不過，父親為鄭重起見，請母親專程去

一趨蘇州。蘇州城裏，有一位足智多謀，心細如髮的朱絨卿先生，他和父親是結拜兄弟，又復是我的義父。於是，由朱絨卿先生定計，一路掩蓋到底，爽性正式宣告我的死亡，再備下一口棺材，棺材裏都裝上石塊，假戲真做的辦過喪事。然後，把棺材暫厝在一個廟裏。」

青年朋友們，這就是半個世紀又五年以前的一段情奔故事了。你能說它有舊說部裏千篇一律的：「公子落難，富家千金小姐後花園私訂終身」，不久落難的公子中了狀元，歡天喜地，洋洋得意的前來迎娶，那一份羅曼蒂克的意境，以及皆大歡喜，博君莞爾的喜劇氣氛嗎？同時，拿它和你們過去、現在或未來的戀愛——婚姻歷程兩相對照，你是否覺得，落伍再落伍，頑固更頑固，老了的那一代，至少也是老祖父、老祖母的一代，在爭取婚姻自由的時候，是不是也跟你們一樣的迸發出光、熱與力呢？

風呂屋裏男女共浴

蔣女士談笑風生，却語重心長的再往下說：

「談過了古老的戀愛故事，婚姻問題，此刻，

我們可以回過頭來，再談談萬千青年，最最懂憬的留學了。恰好，我也有過三度留學的「輝煌」經歷，第一次，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五月，留日。第二次，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三月，留法，兼且在德國住過一段時期。第三次，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元月，還是留法，不過，也曾留英，遨遊義大利、希臘、土耳其、蘇聯。在此必須強調的是，對於我來說，我所謂的「留學」

，着重居留之「留」。至於「學」，我則是一無所成的。

「現在，請容我追憶一下，我平生第一次，在十七整歲那年，首度飄洋過海，遠適異域，我所嘗到的是什麼滋味。

「時間是，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五月十四日凌晨，由上海駛往長崎的日本客輪「博愛丸」，自虹口碼頭啓碇。

「博愛丸徐徐駛出吳淞口，一到海上，便碰上了惡劣的天氣。從窗口外望，層層疊疊的雲霧，堆砌在海天之間，風高浪急，波濤衝擊着船舷，船身立刻便劇烈的顛簸。一陣頭昏，只想嘔吐，一會兒，徐先生也和我一樣的暈起船來。

「五十五年前這是我們平生第一次航海。記憶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茫茫的空白，因為一路上我什麼都沒有看見，航行時間多半躺在艙裏，嘔吐得胃中空空如也，風浪小時才能勉強掙扎起來，到餐廳裏進食。西餐味道不好，刀叉更不會使用，我怕人家笑話，暗中注意別人的動作，心摹手追，依樣畫葫蘆。徐先生却不管這一套，他用他自家的方法吃大菜。

「由於暈船，無法欣賞海上風光。船到長崎，身體仍還覺得虛軟，腦子裏也是昏昏沉沉的。乘火車到達了東京，我們找一家旅館暫時住下。

「每每，我望着徐先生，這個極其熟悉却又非常陌生的男人，我內心喜悅，但也有如夢似幻的感覺，我經常在問自己：這一切，難道果然是真實的嗎？

「語言不通，舉目無親，初到東京的時候，處

處都感到不便。幸好不久以後，徐先生遇見了幾位熟朋友，其中有一位無錫人龔先生，他介紹我們到他所住的「下宿」，租了一間六蓆小房。房東是日本人，樓下除了自家住用，將另兩間餘屋分租。我們的右鄰住着一位日本小姐，她大概是在上班，每天早出晚歸。樓上三間，住的全是中國學生。其中一位楊先生，是新疆督軍楊增新的公子，他對我們隔壁的芳鄰可能情有所鍾，因此我們常常聽到他在向那位小姐說：「あなだは美」，意思是說：「妳很漂亮」。

「我們所住的那間房實在嫌小，唯一方便的是左鄰盥洗室。一日三餐，由房東親自送來，通常是兩菜一湯，白米飯一小桶，放在一隻小方漆盤中。盤下有四隻矮腳，落在地面就是一張小几。吃飯時席地坐在榻榻米上。我們對於這種吃法很不習慣，尤其菜餚雖然是中國做法，口味却相差不可以道里計，於是我們常去中國飯館吃飯。當時唯一感到高興的事，便是秋涼時分，在東京也可以吃到淡水蟹，滋味還很不錯，據說這種螃蟹是早年中國水手移植過去的。

「我在生活方面最感困擾的就是洗澡，日本盛行男女同浴，大家赤身露體的共浴於一池之內。他們習慣了當然不以爲奇，但在我們中國女人看來，簡直不可思議。我們的「下宿」裏沒有浴室設備，要沐浴一定要上澡堂，就是日本人叫做「風呂屋」的。在我們附近的一家「風呂屋」，總算男女分浴，可是中間祇隔一道薄薄的木板短牆，女池的隔壁就是男池。我第一次進去，一見浴室裏有那麼多人，嚇得真想回身逃走，却是不好

意思，只好硬起頭皮，用最快的動作解衣入池，殊不知又被同浴的日本女人趕了出來，然後半用手勢半說明，教我怎樣洗東洋澡：先在池外用肥皂擦身，沖洗乾淨以後，再下池子去泡。我一一遵照做了，這纔下水，一轉眼，又看見僅在腰上繫條毛巾的澡堂男工，提着水壺，登登登的在池邊木板上跑來跑去。他對於浴室裏的女人固然視若無覩，但我却已羞得無地自容。從此以後，我是再也不敢去澡堂洗澡了，買了一口瓦缸，請房東替我燒水，就在缸裏解決清潔問題。

鄭文公碑寫一大堆

「房租伙食，每人每月日幣二十一元，以當時國內物價比較，算是相當貴的。不過那時候我根本不懂家務事，倒也不覺得生活程度高了，會有什麼了不起。

「然而，不通日語總歸不行，於是請了一位老師到家裏來教，徐先生和我一道學習。這位老師當然不懂中國話，授課的時候就用筆談，可惜的是化了半年的功夫，却什麼都沒有學到。上日語課以外，徐先生又教我習字，臨的是鄭文公碑，每天要寫好幾張。我很喜歡日本的習字紙，寫好逐日保存，記得回國時一紮紮的放在地上，已有兩尺多高。

「剛到日本的時候，因為人地生疏，又是初次離開家庭，精神上很感苦悶，徐先生不大了解我當時的心境，因此他不能給我多少安慰。我萬分惦念着父親母親，不知道他們在我離家出走以後，會怎樣的着急，更憂慮他們將怎樣處理這件大

事？是不是親戚朋友們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出走？種種問題，都使我日夜難以安寧。最感煩惱的還是我和徐先生私自離家，悄然出走，就怕人家知道，我為此改名換姓叫做鄭碧微，因而常有不見天日的感覺，在精神上負擔很重，時時都在就心被人家發現我的行蹤。每次有人來看徐先生，我就必須躲躲藏藏，可是屋子只有一間，無處匿身，祇有避到洗手間裏去。要是徐先生和客人談得高興，那我就得長時間的站在廁所裏，大受其薰了。

「樓上的三位中國同學，可能已經知道了我們的秘密。龔先生有時就會調侃的從樓上朝下喊：『老徐，你們宜興有位蔣梅笙，你知道嗎？』梅笙是我父親的號，他這樣提名道姓，顯然別有用心。我聽了以後，心中更加難受。

「三個月了，姐夫從復旦大學畢業，東渡日本留學；他找到了我們，使我得到無比的安慰。因為我只有一个姊姊，所以我一直把姊姊當做我的長兄。他在東京，我就等於有了親人，經常來往，心情漸漸的寬鬆。但是也正由於他的敘述，使我知道在了我離家以後父母的焦急與緊張，以及出走事件在上海與家鄉如何鬧成軒然大波，父母為我蒙受了多少冤枉指責，譏諷嘲笑，使我這顆恹恹的心，更增無限的疚愧和悔恨。

「姊姊說：當假的『噩耗』傳到了姊姊家裏，姊姊信以為真，手足情深，立刻便痛哭起來。倒是姊姊心知這件事情必有蹊蹺，他請我姊姊莫哭，他說應該探聽一個究竟。

姊姊又說：伯父那邊也接到了父親的通知，

但是伯母絕不相信，她一向和我母親不太和睦，難免在伯父面前說了許多挑撥的話。同時我和徐先生出走的事也在漸漸的張揚開來。這一下可就鬧得滿城風雨，譏評四起，伯父寫封長信大大的教訓父親一頓，責他管教不嚴，竟讓訂了親的女兒，跟人逃走！

「父親母親爲了我的事情，不知遭了多少氣惱，受過多少委屈。民國初年，還很守舊，我家又是宜興望族，書香門第，出了這種從所未有的事，那簡直是地方上的大新聞！好事的人渲染附會，消息越傳越廣，不久以後蘇州親家也聽到了風聲，他們當然是十分的憤懣，不過痛定思痛，也曉得真相如果揭露，對於他們自家同樣的是大失面子，所以他們也就不再深究。

「聽了姊姊的種種敘述，我覺得萬分的慚愧和難受；父母生我育我，我不但沒有報答親恩，反而給他們帶來如此深鉅的打擊和傷害，思前想後，我不禁痛哭失聲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我才鼓起勇氣寫信回家，向兩位老人家請求饒恕。

「父母愛子女的那一顆心，真像汪洋大海一樣的深邃，我以為父母的覆信一定會對我痛加指責，至少，他們也將餘愠未息的根本不回我的信，只當我這個女兒真的得病死了。可是，我接到他們的回信時，雙手捧着信紙，幾至哽咽不能成聲。啊，慈祥的父親母親，儘管我罪無可道，他們畢竟還是原諒了我。

「日本的印刷術優美精良，他們所出版的藝術書籍相當豐富，還有許多仿印的原畫，都是徐先生視為至寶，愛同拱璧的。於是他經常到各書店

去瀏覽觀賞，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慮的買它下來。有時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，當時我太年輕，對於藝術簡直一竅不通，根本就不發生興趣。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，一坐就是半天，那種况味實在不大好受。

「然而我當時還沒有想到，更不好受的况味還在後頭，我們在東京住了半年，旅費和生活費用花得並不多，倒是徐先生大量的買書買畫所費不貲，因此我們帶來的兩千塊錢很快的就要完了。東京居，大不易，再拖下去就得挨餓，於是我們只好在當年十一月間，又從東京回到了上海。

故都歲月既窮且愁

二到上海，起先還不敢回家，找一家旅館住了幾天。母親聞訊趕來探望，她見我們住旅館既不方便，花錢又多，因此就在民厚里一位朋友家裏替我們租了一間廂房，要我們搬過去住。這地方離我們家只隔幾條街，我們每天都可以到家裏吃飯。

「徐先生再去拜見康有為，康先生說現在歐戰正酣，你們既不能啓程赴法，最好還是先去一趟北平，看看能否弄到一個官費，將來出國，兩個人的生活可以過得寬裕些。他又說，如果我們願去，他將給我們介紹幾位朋友，請他們幫忙。

「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，十二月間，我們又踏上了北上的航程。從上海到北平，照說應該走津浦鐵路，但是徐先生爲了省錢，他決定乘海輪到天津。

「我們所搭乘的船很小，也不知道徐先生買的

是什麼艙位。一上船，便發現艙房裏一片黝黯，上下舖位共有十個之多，而且男女混雜。我們艙裏就只有我一個女人，其餘都是些做小生意和做工的。處在這種環境裏面，我內心非常苦惱，可是又不好說什麼。挨過了幾天漫長的日子，船到天津塘沽口，那裏居然沒有碼頭，上岸的時候，中間有一截路必須涉水而過。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僱一個工人把我背上岸去，當時真覺得難過，滿心委屈，只是連一句怨言都不敢說。

「由於朋友的介紹，我們認識了住在北平東城方巾巷的華林先生，華林先生住的是一座四合院，兩進深，各有兩列廂房，華先生住後進，一排三間。他讓出一間正房給我們，中間客廳公用，租金呢，一家一半。

「徐先生拿了康有為先生的介紹信，去看羅癭公先生，羅先生是康有為的大弟子，和樊樊山先生，易實甫先生，同爲當時北平的三大名士，在政教兩界，說話都很有力量。羅先生夫婦對待我們非常好，一口答應幫忙，隨即寫信介紹徐先生去看教育總長傅增湘，請他給徐先生一個公費名額。傅先生看了羅先生的信，立刻答應照辦。不過當時歐戰未停，航線不通，他說只要停戰開航，他馬上就派遣徐先生以官費生的資格，去法國留學，繼續深造。

「這樣，我們就在北平住下，一心一意等待世界大戰結束。希望雖然有了，生活還是艱難，華林先生看出我們的窘迫，便介紹徐先生去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。蔡先生也是熱心而愛才的人，北大沒有藝術系，他便專爲徐先生設立了一

個「畫法研究會」，聘請徐先生擔任導師，北大同學中凡是對藝術有興趣的，都可以參加研究。「畫法研究會」有一位幹事陳邦濟，浙江東陽人，他和狄膺先生是同學好友，由他介紹，我們認識了狄先生。以後他便常來我們家走動，當時狄先生在北大很活躍，身兼好幾個會的總幹事。

「北大給徐先生的薪水是每月五十元，但是要搭發什麼交通票，拿到市面上要打七折或八折，所以實際收入只有三十多塊。另一方面，由於華先生的關係，我們又認識了李石曾先生夫婦，李先生剛剛創辦孔德學校，請我去教音樂。孔德學校就在我們住處的附近，來往倒很方便。

「時值民國成立以後第一次小康局面，國家無事，北平城重又恢復了歌舞昇平的氣象。羅癭公和易實甫兩位先生都很熱中於捧戲子。他們先捧梅蘭芳，尙小雲等男角，後來易先生捧仙靈芝，羅先生捧劉喜奎，這兩位就都是坤旦了。一次羅先生偶而聽到程硯秋演唱，大爲激賞，認爲他將來必定是可造之才，前途無量。可是當時的程硯秋還沒出師，他師傅也在想把他培養成一株搖錢樹。於是羅先生半用金錢半用壓力，爲程硯秋「贖身」，替他租房子成家，全力捧場，程硯秋就此一帆風順，享譽紅氍毹。

梅蘭芳天女散花圖

「羅先生他們爲戲子捧場，每天都要包下戲院頭幾排座位，拿了戲票到處請朋友看戲，徐先生當然也是被請者之一。因此他每天晚上都要出去聽戲，散場回家，時間已近午夜，我必須深夜等

他的門。那時沒有電鈴，也沒有電燈，我們住在後進，從房間裏摸黑到外邊開門，要經過兩個院子，走一大截子路。黑洞洞的，心裏不免駭怕。同時每天晚上獨自枯坐幾個鐘頭，也感到寂寞無聊，於是我請求徐先生，可不可以別再去聽戲了？但是他答應。爲了心中不平，一氣之下，我也去聽戲。誰知當年北平戲院男女分座，男客在樓下，女客在樓上，座位都是條櫈。這一下散戲自己回家，路上更駭怕。經此一窘，我便不敢再輕易嘗試聽戲的滋味了。

「羅瘦公捧程硯秋，同時也捧梅蘭芳，『天女散花』新劇排演成功，首次演出，轟動遐邇，一般『梅迷』大爲興奮。於是由羅先生出面，請徐先生爲梅蘭芳畫一幅像，畫中服飾就用天女散花的戲裝。徐先生欣然應允，化了好幾天，畫了一張『天女散花圖』，這是一幀立軸，長約四尺，畫成之後，羅先生十分讚賞，他並親筆題了一首七絕，我依稀記得是：

「後人欲識梅郎面，無術靈方可駐顏，不有徐生傳妙筆，焉知天女在人間。」

「我初到北平，不但鄉音未改，而且還聽不懂那種地道的北平話。平時既沒有談話的對象，朋友中女性更少，因此我覺得非常寂寞。往後幾年裏，雖然經常聽朋友在說北平住家怎麼理想，可是我就從來不曾想過要到北平去住。因爲在我的記憶裏，我那北平一年的生活，祇有苦悶和貧窮。」

「方巾巷住了半年，轉眼間到了暑假，北大有許多教授和學生，集體到西山碧雲寺避暑，我們

也參加了這個小小的集團，把方巾巷的房子退掉，兩個人搬到了故都名利碧雲寺。

「碧雲寺殿塔亭臺，重門疊戶，規模相當宏大，內部十分幽深。我們和顧孟餘先生夫婦合住一進屋，李石曾先生夫婦住在另一進，此外還有許多教授學生，同住在另外一個院落。碧雲寺有廚子，專門爲我們燒飯，每月伙食費大約是每人七塊錢，生平第一次吃蕃茄，就在碧雲寺裏。北平人叫蕃茄爲西紅柿，紅綠相間，鮮艷欲滴，不過我們所吃的西紅柿多半是塞肉的。」

「這一羣人住在一起熱鬧極了，因爲四週風景優美，彼此又很談得來，加以誰都沒有固定的事情要做，所以情緒上特別感到輕鬆愉快。每當月明星稀，大家三三兩兩，坐在碧雲塔下，石臺階上，聽鐘聲梵唱，談生平抱負，海闊天空，無所不至。同學中我能記得姓名的祇有兩位，一位是羅家倫先生，另一位是四川人杜岑先生，抗戰時他在重慶銀行界服務。」

「碧雲寺住持聚林法師，是個好人，但却不是好和尚。他不如素，而且還喜歡喝兩盅，曾聽人說他在北平城裏還養着女伴。他和我們這羣人處得很好，跟徐先生也成了要好朋友。兩個月輕鬆愉快的避暑生活過完，徐先生要帶我下山時，他聽說我們沒有住處，自動把碧雲寺的下院吉祥寺方丈室借給我們，地點在後門大街，距離什刹海不遠。盛情難却，於是我們便搬了進去。那座方丈室在大殿後面，單獨一個院落，房子是一排三間，搬去以後，我們雇了一個老媽子，自己起伙。這位老媽子姓程，有個女兒，嫁給當時的駢文

大家通電聖手饒漢祥做姨太太，我們背後開玩笑的說她是饒漢祥的丈母娘。

花和尚的藏嬌金屋

「有一天我在東邊房間發現牆上有一道祕門，門嵌在牆裏，門扉同樣的糊紙粉刷，所以一時不容易看得出來。推開這扇祕門，赫然別有洞天，不但有一間小房，而且還有一個三角形的天井，方丈室裏要這道祕門幹嘛？是否就是和尚的藏嬌金屋，我們不敢妄加猜測，不過正好，程媽有了合適的住處。」

「這時候有一位吳先生，得到李石曾先生的幫忙，在碧雲寺大殿前面一排側屋裏，開設了一所專練中國武功的學校。吳先生和我們成了朋友，我常去參觀他們打拳練功夫，到也覺得有趣。」

「十月間，同在北大任教的朱家驊先生，從北平啓程第二次赴歐洲，徐先生一聽朱先生動身了，馬上就去見傅增湘先生，問他爲什麼朱先生走了我們還不能成行；傅先生勸他說：戰爭還沒停止，你又何必這麼着急呢？徐先生回家，爲這件事很不高興。」

「自從到了北平，我們一直很窮。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飯，或者是參加應酬，碰到家裏青黃不接，他也多半不大在意。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兩個銅元，折算起來還不到一分錢，正在發愁，程媽說先生不在家吃飯，我們馬馬虎虎買半斤麵下了吃罷。我問她半斤麵要多少錢呀？她說得四個銅子。我一時拿不出來，只好叫她先墊一下。第二天逼得沒法，想拿母親給我的一隻金鐲去

當掉，但是徐先生不肯上當舖，他的理由是一個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飾去當，人家會怎樣想呢？無可奈何，我只好硬起頭皮自己去。一出門就是後門大街，大街上有當舖，門口掛着厚厚的棉布帘，我在門口逡巡許久，一方面缺乏勇氣，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見，最後我想起不進去不行。這才在

四望無人的時候，一頭鑽進了棉布門帘，抬眼一望，當舖櫃臺比我的人還高，我舉起手將金鐲遞給朝奉，他接過掂量一下，說是可以當四塊錢，我一聲不響，拿了四塊錢和當票就回家。

這隻手鐲，份量不重，雕鏤的花紋却還美觀，呈月牙形，嵌着一朵四瓣的花。鐲子後來由徐先生贖出，我一直戴

在手上，到巴黎後，

不知怎麼弄斷了，結果還是賣給了法國銀鋪。

徐先生和我也喜

歡貓，在北平養了三頭小貓，夜裏同一個被窩睡覺。羅瘦公先生的長女公子，有一頭貓高大肥壯，皮毛是黑白兩色的，光澤潔亮，站着可以垂到地面，樣子長得極為神氣。羅小姐在結婚之前病死，羅家上下看見這貓就要想她，一想起她就會傷心，但是貓兒實在太好，又捨不得丟掉，於是就將牠轉送給我們。我們高興極了，離開北平的時候，更不忍

和牠分離，便帶了牠坐火車回上海。時值冬天，氣候很冷，我把牠用毯子裹起，抱在懷裏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抱的是孩子呢。但是到了上海，還是因為衙堂房子太窄，養這頭貓不方便，無可奈何便把牠寄養到康有為先生那邊，歇幾天去看牠。那知牠被狗咬了一口，我們都覺得心裏很難受。這頭貓後來也就留在康家了。

「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十一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，徐先生再去見傅增湘先生，傅先生開口第一句話便說：『好了，你們現在可以出國了。』然後他立即派徐先生以官費生資格赴法留學。徐先生領到了治裝費和旅費，帶我回到上海，積極進行出國的準備。

「在這一段時間，徐先生曾和我到哈同花園，去見哈同總管姬覺彌先生。姬先生對待我們很好，大家談得十分高興，他還稱讚我是福相，對於徐先生的前程一定會有幫助。他聽說我們要去法國，送了我們三千元的程儀，並且親口答應，以後每兩個月給我們寄三百塊錢。徐先生因為到歐洲路途太遠，把他在日本所買來的藝術品和書籍字畫，全部寄存在哈同花園。後來這批東西就此不知下落，而且，姬先生從我們到巴黎後，一直都不曾實踐諾言寄過錢來。我早期的留學生活，也就不言而喻有多麼艱苦。」

請購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有永久保存價值的
中外雜誌合訂本。

蔣碧微女士由義大利經蘇聯返國途中。

